

春秋戰國山東和 秦國士人的政治取向

● 王長華

春秋戰國時期士人參政之風盛行。從總體上看，此期士人參政的方式呈兩種取向：以孔子為開端、以齊國稷下學宮為典型代表的山東士人是以「不治而議論」的文化批判方式參政的；西方秦國士人則逕直走進政治權力中心，親身參與了秦國政治的設計和運作^①。山東與秦國士人政治取向上的分途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造成兩者政治取向差異的原因、具體的差異表現以及各自對現實政治產生的影響卻有必要進一步討論。

一

一般地說，形成某群體一致性行為為特徵的原因大體有三：一，立足的文化傳統；二，面對的時代需要；三，個人志趣性格。三者的綜合往往成為群體一致性行為發軔的起點和基礎。春秋戰國時期山東與秦國士人形成以地域為界限範圍的各自總體上的

相近和一致，也不難由上述三者得到說明。

先談文化傳統。應該說，春秋戰國時期山東各國都是周王朝的分封諸侯，「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虛曲阜，是為魯公。」^②「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③「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④「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周公誅滅唐……於是遂封叔虞於唐。」^⑤即使地處蠻夷的南方之楚，也是受封於周王朝的，「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⑥。這種分封不僅使諸侯得到了封地，而且也把周王朝的文化帶進和引入封地，從而使山東各國的政權成為周天子的政治派出機構，而其文化和意識形態也無法擺脫周文化和意識形態的派生品格。以周文化為其宗主和傳統，這不僅在較大程度上影響到山東各國思想文化的形成，甚至也在一定程度上決定和制約着山東各國思想文化的發展方向^⑦。

如果說山東各國深受周文化的影響制約，從而自覺地以禮樂制度為自己的文化根基和傳統的話，那麼少有文化積累的秦國卻幾無任何文化拖累，他們在攻伐兼併的較量中具有極強的適應性。

秦國則不然。西周初建之時秦還只是「在西戎，保西垂……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的落後部族。「周厲王無道，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滅犬丘、大駱之族。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為大夫，誅西戎。」到文公十三年（公元前753），秦「初有史以紀事，民多化者」，「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⑧。可見秦人的開化遠較山東各國為晚，與周王朝、周文化的真正接觸也只是到西周晚期才正式開始。秦人的文明後進使其成為西周王朝衛星諸侯國中的一個後進者，也成為當時諸侯的一個特例。由於秦的文明後進，周文化對其產生的浸潤和影響膚淺而微小，因此秦與周王朝長期保持着一種疏遠和鬆散的關係。正因為如此，如果說山東各國的思想文化與政權形式相一致，深受周文化的影響制約，從而自覺地以禮樂制度為自己的文化根基和傳統的話，那麼秦人則是腳踏自然的節拍，以其質樸粗放的原始性為自己的文化傳統的。

受兩種不同文化傳統的滋養和潛在支配，山東與秦國士人在面臨大體相同的時代變局和需要時，各自所感受到的問題和作出的回應姿態也存在差別。山東各國自周初分封立國以後，是按部就班、正常而緩慢地發展着的。周王朝由西而東，歷史由春秋而戰國，禮樂征伐漸次由天子出而至由諸侯出，並進而由大夫、家臣出，這種每況愈下的政治權力變化同時帶來了文化由學在官府到學入民間的變化。文化下移使士人迅速崛起，但禮樂文化先天具有的保守品格雖歷經坎坷仍被山東士人自覺不自覺地帶進了新的時代。其具體表現為，山東士人普遍存在崇古傾向（其中以儒、墨、道家士人為最），也普遍自覺地

與現實政治保持某種心理或現實距離。

秦國士人則不同。由於秦國與周文化接觸較晚，受影響很小。而當秦國與山東各國一樣成為周王朝大家庭的成員時，離尊王的政治文化秩序被打破已為期不遠，而富強和稱霸則很快就成了時代的新要求。文化傳統是一把兩刃劍，它既是擁有群體的巨大財富，又不免成為這一群體面臨新抉擇和新發展的負擔。這一點在山東各國的發展進程中表現得非常明顯。而少有文化積累的秦國，在歷史巨變的春秋戰國時期卻幾無任何文化拖累，他們輕裝上陣，唯利是視，在攻伐兼併的較量中具有極強的適應性。具體落實到士人作為方面，在秦國，不管是土生土長的士子樗里子、魏冉，還是由東而西的商君、張儀等客卿，都理性自覺地把對尚利和恃力的認識，通過爭得國君支持而以行政和法律的方式完全貫徹到秦國的政治運作中去。對此，山東各國士人卻做不到。

在性格志趣和為人風格方面，山東和秦國士人也從整體上表現出不同傾向。山東士人中，早期的孔、墨堪稱時代文化符號自不用說，即使身處「天下尤趨謀詐」時代的孟、荀以及齊國稷下學宮中的眾多士人，其性格和為人風格也大都體現出書卷氣和迂闊氣多，而功利、詐譎、刻薄者卻極少見。秦國士人於此卻大有不同山東士人者，如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商君之少恩矣」^⑨；張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真傾危之士」^⑩；甘羅「非篤行之君子」，「亦戰國之策士」^⑪；范雎、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⑫；李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

合，嚴威酷刑」^⑩。這當然並非此期秦國士人之全部，而且也多為由山東入秦者。即使如此，秦國士人總體的為人風格和性格已足以由此見其一斑了。商君等人幾乎清一色來自山東，從思想文化淵源看不應與山東之三晉無關。但他們自覺選擇秦國作為一生建立功業的立足地，更從反面說明這些得意於秦國政壇的士人與終生不出山東的士人在性格志趣和為人風格上的不同了。此種不同雖看似皮毛，但卻在很大程度上制約和影響着各自的立場選擇和前途發展。

綜上可見，腳踏的文化傳統、對時代變局的理解和回應、個人性格和為人風格等因素，整體上對春秋戰國時期山東與秦國士人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影響。這一切綜合構成了雙方在選擇各自立場時的基本前提和基礎，也構成了各自處理自身與當下政治關係時的前提和基礎。

二

下面討論東西士人在安放自身與政治之間的關係時所出現的選擇差別的種種表現。在問題展開之前，我想舉荀卿為例，作為討論此一問題的楔子。如所周知，荀子曾自山東前往秦國。此事於他人或許並無特別的意義，而於荀子卻非比尋常。因為他既在稷下「最為老師」、「三為祭酒」，又曾擔任楚之蘭陵令，而且還培養出韓非和李斯這兩位影響戰國晚期秦國政治頗大的學生，這就使他的西游秦國以及對秦國政治的評價具有了特別意義。史載，荀子在回答應該「入秦何見」的提問時，先講了一番他在秦國看到的種種欣欣向榮、秩序井然的現

象，然後話鋒一轉說：「雖然，則有其謬矣，兼是數具者而盡有之，然而縣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倜倜然其不及遠矣。是何也？則其殆無儒邪！故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⑪荀子的政治理想顯然不像孟子那樣激烈地倡王反霸，但他對王、霸之評價並非一無軒輊。在荀子看來，他更鍾情於王道，而把霸道僅視為低於王道的第二政治等級。荀子認為使王道政治得以實現的關鍵是看國中是否有「儒」，「儒」不同於「士」，也並非指一般儒家學者，而是指具有道德、修養、學問、治政能力等的一種理想人格，其中以道德文化輔政佐君的素質要求是最核心的^⑫。照這個要求，荀子有理由對秦國的政治提出批評。「儒」為「秦之所短」，也極可能是促使荀子入秦而又出秦的原因所在。事實上，荀子對政治的這一要求，正劃出了山東與秦國士人看待政治的一大區別。

查諸史實，春秋戰國時期即使不把秦國土產的士計算在內，僅由山東入秦的士人就相當可觀。但荀子依然批評秦「無儒」。為甚麼秦有「士」而無「儒」？或者說，為甚麼不能稱秦之「士」為「儒」？這是有原因的。照荀子對「儒」的要求，可見「儒」比一般士人具有更高的文化規格。那麼高文化規格的「儒」的出現，實際上既需要豐厚的文化土壤滋養，又需要寬鬆、自由的政治環境的培育。從某種意義上說，山東基本具備了這些條件，特別是在戰國中晚期的齊國。當然，從諸侯君主的本意講，似乎沒有哪個執政者不希望士人為自己的統治帶來具體利益和實惠。孟子見梁惠王，梁惠王劈頭就問：「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⑬「田駢以道術說

荀子認為，「儒」是指具有道德、修養、學問、治政能力等的一種理想人格，其中以道德文化輔政佐君的素質要求是最核心的。荀子對政治的這一要求，正劃出了山東與秦國士人看待政治的一大區別。

山東各國君主對士人的師友之尊和禮貌對待，給士人帶來精神上的自由和放鬆。在這種情況下，士人的「修文學」、「不治而議論」、「作書刺世」才可能發生，大量的學術文化產品才可能源源不斷地產生。更重要的是，士人和政治之間才能因此保持一種相看兩不厭的正常關係。

齊，齊王應之曰：『寡人所有者齊國也，願聞齊國之政。』^①這都是人們耳熟能詳的典型案例。但是，山東士人賴以生存的環境還有另一面，如齊宣王就曾宣稱：「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②以著名士人學者為大夫國人之楷模，政治家是企圖借文化以潤飾政治；而從士人角度看，此舉卻正為學術文化的開展提供了物質和環境保證。正因為如此，齊國「方齊宣王、威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崇之。若鄒衍、田駢、淳於髡之屬甚眾，號曰列大夫，皆世所稱，咸作書刺世」^③。士人們所在被尊之重之、享受優厚的生活和政治待遇的情況下，盡情「作書刺世」，以發揮自己的文化功能，這是十分可貴和難得的。

秦國士子客卿面臨的是另一種境遇，表現出的是另一種處世和生存風格。從商鞅到李斯，秦國歷代君主麾下都有知名士人為之奔走，應該說曾在秦國各領風騷若干年的士人都是那一時期的出色人物。從他們棄故土奔他鄉、隻身由東入西的選擇看，他們當中甚至不乏獨立不羈的思想者。但是，當他們一旦成功游說秦國君主，一旦靠近秦王、執掌秦國權柄以後，這些昔日的辯士便幾無例外地一天天委瑣和卑下起來。其作為再難見到飛揚的風采和想像力，充斥生命空間的只有富與強的功利計較和尊君愚民的上書獻策，等而下之者甚至不惜為邀功固寵而造假扯謊。從秦國君主方面看，他們對士人有着遠比山東各國君主明確、具體的功利要求，希望對內幫助鞏固專制、對外幫助開拓疆土。從士人方面看，君主對自己的要求也差不多就是自己企圖達到和實現的

目標，而很少見到秦國士人為君主要求 and 自身理想之間存在差距而苦惱。至於像孟、荀等山東士人所表現出的崇道不崇勢、從道不從君、以道義理想為價值追求，卻基本未提上日程。

受不同政治範導力量的驅使和推動，山東和秦國士人自然表現出不同的目標追求。但事情遠沒有到此為止，由於山東各國君主普遍存在以士人為「諸大夫國人」「矜式」的傾向，而秦國君主一貫以士人為爭強爭勝之籌碼，這又進一步導致東西士人在受尊重程度和精神自由度方面的明顯差異。在山東，子思曾對魯繆公友而不師深表不滿^④，魏文侯對段干木曾「過其閭而軾之」^⑤，費惠公更說：「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⑥山東各國君主對士人的這種師友之尊和禮貌對待，首先給士人帶來的是精神上的自由和放鬆。有了這種精神上的自由和放鬆，士人的「修文學」、「不治而議論」、「作書刺世」才可能發生，大量的學術文化產品才可能源源不斷地產生。更重要的是，士人和政治之間才能因此保持一種相看兩不厭的正常關係，如孟子所說：「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⑦

秦國士人對此的經歷和感受卻是另一番景象。一般說來，西入秦國的士人接近秦王、爭得秦王信任的辦法，大都靠一篇動情曉理的說辭和一套使秦國由貧變富、由弱轉強的設計方案打動之。利害動人，一言中的的說辭和方案如能中秦王之懷、得到首肯，接下來便是加官晉爵、委重任於廷前。但是，士人以利害打動秦王的

同時，秦王也已視士人為利害的打動物了。也就是說，士人自進入秦宮的那一天始，他本身就已經被綁上秦國政治的戰車，成為秦國政治機體上的齒輪和螺絲釘，而完全喪失了超越於政治利害、政治計較之外的能力。如商君對趙良的建議完全聽不入耳^⑳，范雎在所任之人負罪後恐懼「內慚」、「不知所出」^㉑，李斯失寵於二世後「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㉒，都是很有代表性的例子。孟子曾尖銳批評秦國士人公孫衍、張儀的行為是「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而獨標「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㉓。可以說，孟子的批判並不僅僅適合於公孫衍、張儀二人，也適合戰國時期秦國絕大多數士人。由此可見，被政治機體工具化的秦國士人與進退自如、綽綽有餘的山東士人由於選擇的政治站位不同，因而在受尊重程度和精神自由方面再次顯出差別。

山東與秦國士人在受尊敬程度和精神自由度方面所得到的不同待遇，究其原因或許主要來自雙方君主。但東西士人對學術文化抱持的不同態度並由此產生不同的學術文化結果，卻只能從雙方士人自身尋找原因。關於春秋戰國間王官之學流散天下，諸子百家各聘其思、各逞其辭的紛繁景象，古人多有描述：《孟子·滕文公下》謂之「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荀子·解蔽》謂之「諸侯異政，百家異說，則必或是或非，或治或亂」；《尸子·廣譯》謂之「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圍，其學之相非也數世矣」；《莊子·天下》謂之

「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作為春秋戰國之際官學下移、諸子蜂起的歷史記錄，上述種種說法是真實不移的。但我們不難發現，這種「處士橫議」、「百家異說」的歷史事象僅發生於山東，而與西方秦國基本不發生關係。有論者謂：「先秦所謂『百家爭鳴』的時代主要是和稷下時代相重疊的」^㉔，似也基於同樣的事實。山東士人學者對自身角色的堅定認同，以卓越的學術成就和非凡的思想創造構築了百家爭鳴的時代，並且將智慧的結晶留存世間、傳之後人。這是山東士人自覺勞動的結果。

秦國士人對學術文化卻持另一種態度。為了富國強兵、為了鞏固王權，他們不僅放棄文化擔當，而且主張用行政手段壓抑、消滅文化。商君在輔佐秦孝公時就提倡「困末作而利本事」^㉕，嚴厲打擊「好言談」、「辯慧」者。此後張儀、魏冉、范雎等，或忙於外交場上的縱橫游說，或熱衷於攻伐兼併和宮廷爭鬥，學術文化卻從不提及。至戰國晚期，韓非、李斯又分別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入手，不僅全面、徹底消滅了秦國的學術文化產品，「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㉖；而且亦同時鏟除了秦國學術文化再生的可能性，「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㉗。毫無疑問，秦國士人對待學術文化的態度以及對之採取的種種反對和滅絕措施，都是出於維護秦國君主和政治利益的單一考慮。身為士人而思想和行為恰恰站在士人立場的反面，這是山東士人所不為的。

秦國士人為富國強兵、為王權的鞏固，不僅放棄文化擔當，而且主張用行政手段壓抑、消滅文化。如商君提倡嚴厲打擊「好言談」、「辯慧」者。身為士人而思想和行為恰恰站在士人立場的反面，這是山東士人所不為的。

三

學術文化與現實的政治運作本來並不發生直接聯繫，它從社會的背後走上前台，從理論上講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但在春秋戰國這個特殊時代，由於士人的勃興與活躍，學術文化則迅速對現實政治產生作用和影響，並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政治的運行方向和結局。

早在秦漢時期，呂不韋和司馬遷針對魯、齊兩國的歷史發展就已提出文化選擇與政治發展的利弊前途問題^②。魯國自魯公伯禽變俗革禮、親親上恩，即顯露出「自此削」之徵兆。而齊國自齊太公簡禮從俗、尊賢尚功，則預示未來必有「至於霸」之前途。魯國於公元前249年滅於楚，累於禮樂輕事功或許是其積貧積弱的原因之一。齊國自桓公稱霸至公元前288年與秦同時稱帝，成就強大的主要因素是對國家事功的重視。但齊在政治制度上實行五都制，經濟發展提倡農工商並重^③，特別是在學術文化上採取順其自然的放任政策，說明它與秦國的治國思路大不相同。從文化理路上看，它依然屬於山東並體現了山東文化的典型特徵。魯齊比較，尤其是齊秦比較，不難見文化對政治的制約作用。而在春秋戰國，這一作用就表現得更加直接。

我們仍回到士人與政治關係的角度來展開問題。在山東，士人確實享受了禮遇優待：齊「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鄒子「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撤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室，身親往師之」^④。郭隗在燕，「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⑤。

還有魏文侯之於段干木、魯繆公之於子思、費惠公之於子思及顏般等，都顯示出山東各國君主對士人的敬重和厚待。君主對士人如此，士人從總體上仍「作書刺世」，對現實政治持冷靜的批判態度，墨子再三指斥「今王公大人」，孟子抨擊現實是「民之憔悴於虐政」堪稱代表。由此可見，山東士人與現實政治始終保持一段距離，其思想學術展開也始終堅持相對獨立的明確的文化立場。從士人與政治的關係看，現實政治期待士人的參與，而士人所給予現實政治的只是文化支援。在那個以力相爭的時代，山東士人的作為事實上起了某種弱化和渙散現實政治的作用。如果僅從歷史成敗的角度看問題，山東士人對山東各國政治的敗落滅亡是難辭其咎的。

秦國的情形就有所不同。自孝公以後的歷代秦國君主一開始對士人就深寄功利期待，而秦國士人也大都給出了功利回報，如「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商鞅「乃遂西入秦」，在說服孝公並爭得孝公支持的情況下實行變法。結果「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⑥。張儀入秦，「惠王以為客卿，與謀伐諸侯」。結果張儀破合縱而連橫，為秦人東進立下汗馬功勞^⑦。甘茂「學百家之術，因張儀、樗里子而求見秦惠王……使將而佐魏章略定漢中地」，「使甘茂定蜀」。結果甘茂使秦「顯名諸侯，重強齊、楚」^⑧。此後，范雎、蔡澤等也無不如此。至李斯，秦國君主與士人更空前一致地把富國強兵、「爭於氣力」作為秦國為政的唯一方針。而且由於有韓非的理論指導與李

山東士人給予現實政治的只是文化支援，但在那個以力相爭的時代，這種作為事實上起了某種弱化和渙散現實政治的作用。如果僅從歷史成敗的角度看問題，山東士人對山東各國政治的敗落滅亡是難辭其咎的。

斯手把手的實踐幫助，秦人不僅完成了君主專制制度建設，也完成了併六國一天下的大業。由此可見，圍繞奪取天下這一目標，秦國君主和士人達成了富強、專制、以力取天下的高度共識，從而把文化與政治合二為一，最終滅六國而一天下。這一結果與山東各國的相繼滅亡是正相反對的。

山東士人堅持以思想學術為重的文化立場，「不治而議論」，在爭得行為和思想獨立於政治之外的同時，未能對瞬息萬變的國際形勢和日趨萎頓的本國政治發揮直接有效的干預作用。秦國士人卻一開始就熱切投入政治，在放棄文化本位的前提下，為秦國的強盛發揮了重要直接的建設作用。從一定意義上講，山東各國的相繼滅亡和秦國的日漸強大，是雙方士人發揮不同作用的結果。但與政治結局相背，雙方士人自身的結局恰恰成為政治結局的反面。山東各國士人在政權和政治滅亡之後不僅大多保住了生命，而且還為後人留下了精神文化遺產。至於秦國士人，在國富兵強、以絕對優勢壓倒東方的秦國崛起之際，他們多數人已為此付出了生命代價，而且除了個別士人以外，他們整體在身後也未留下精神痕迹。這實在值得今天的人們為之深深思索。

註釋

- ① 見拙作〈論秦國士人與政治之關係〉，《河北學刊》，1996年3期。
- ② 《史記·魯周公世家》（北京：中華書局，1975），頁1515。
- ③ 《史記·齊太公世家》，頁1480。
- ④ 《史記·燕召公世家》，頁1549。

- ⑤ 《史記·晉世家》，頁1635。
- ⑥ 《世記·楚世家》，頁1691。
- ⑦ 典型的例是公元前638年宋、楚泓之戰中宋襄公主張「不重傷，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結果大敗。後人常以愚蠢評宋襄公，而我看到的，卻是禮樂文化對宋人產生的極端化影響。事詳《左傳·僖公二十二年》。
- ⑧ 《史記·秦本紀》，頁174-79。
- ⑨⑭⑮ 《史記·商君列傳》，頁2237；2233-35；2231。
- ⑩⑰ 《史記·張儀列傳》，頁2304；2280。
- ⑪⑱ 《史記·樗里子甘茂列傳》，頁2321；2310-21。
- ⑫⑲ 《史記·范雎蔡澤列傳》，頁2425；2418。
- ⑬⑳㉑ 《史記·李斯列傳》，頁2563；2554；2546。
- ⑳ 《荀子·強國》。
- ㉒ 詳見《荀子·儒效》。
- ㉓ 《孟子·梁惠王上》。
- ㉔ 《呂氏春秋·執一》。
- ㉕㉖ 《孟子·公孫丑下》。
- ㉗ 劉向：《荀子敘》，又見《風俗通·窮通》。
- ㉘㉙ 見《孟子·萬章下》。
- ㉚ 《淮南子·修務訓》。
- ㉛ 《孟子·滕文公下》。
- ㉜ 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頁61。
- ㉝ 《韓非子·奸劫弑臣》。
- ㉞ 《史記·秦始皇本紀》，頁255。
- ㉟ 分別見《呂氏春秋·遠見》、《史記·魯周公世家》。
- ㊱ 見周振鶴：〈假如齊國統一天下〉，《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5年4月號。
- ㊲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頁2345。
- ㊳ 《戰國策·燕策一》。

王長華 歷史學博士，現為河北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